

湖湘

翦伯赞 著 李长林 编

历史哲学教程 史料与史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文库

翦伯赞 著 李长林 编

历史哲学教程 史料与史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哲学教程;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11

(湖湘文库)

ISBN 978-7-5355-6343-9

I. ①历…②史… II. 翦… III. ①历史哲学-教材②史学-研究方法 IV. K01 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7630号



湖湘文库(甲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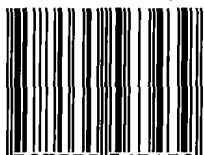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历史哲学教程 史料与史学

著者	翦伯赞
编者	李长林
责任编辑	符本清 喻亚中
特约编辑	黄江文
责任校对	李黎峰
装帧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服电话	0731-85486727 QQ 228411705
印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960×640 1/16
印张	25
字数	267000
书号	ISBN 978-7-5355-6343-9
定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青园路4号 邮编: 410004

ISBN 978-7-5355-6343-9



9 787535 563439 >

前言

李长林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1916年他在北平考入法政专门学校，不久又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始对中国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1924年7月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1926年1月回国。大革命失败以后，1928年秋他在北平结识了吕振羽、谭丕谟等人，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他积极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从1930年冬到1931年春，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本质及其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东方民族革命运动的过去与现在》等一系列论文，^①在文中明确指出了现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35年至1937年翦伯赞又先后发表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③、《关于历史发

① 以上各文分别载北平《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9、10期。

② 《劳动季报》第6期，1935年。

③ 《劳动季报》第8期，1936年。

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①、《“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②、《关于前阶级社会的构成之基本问题》^③、《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④等论文，对社会史论战中出现的“中国奴隶社会空白论”，“封建主义破灭论”，“商业资本主义论”、“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等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为马克思主义赢得这场论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37年5月，翦伯赞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回到长沙，任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常务理事，主编《中苏文化》半月刊，并积极撰文，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动团结抗战，同时进行史学理论研究。1938年他出版了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专著《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他前往重庆，一方面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史学研究。^⑤出版两辑《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⑥等专著。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香港等地继续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解放后，翦伯赞致力于新史学的建设。1958年2月，陈伯达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在史学界煽动极左思潮，次年春夏翦伯赞连续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⑦、《目前历史教学中的

①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

② 载《世界文化》创刊号（1936年11月16日出版）。

③ 载《世界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

④ 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1期（1937年）。

⑤ 《中国史论集》第一辑，由重庆文风书局1943年12月出版，第二辑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3月出版。

⑥ 《中国史纲》第一卷，由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10月出版，第二卷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3月出版。

⑦ 《光明日报》1959年3月28日第3版。

几个问题》^①、《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②等论文，批判了极“左”思潮及其中的奇谈怪论，阐明了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1959年秋至1961年夏，极“左”思潮再次泛滥，一些书刊充斥着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现代化等错误倾向。翦伯赞自1961年7月至次年6月针对这些错误倾向，又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③、《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④等论文并进行学术讲演，揭露批判极“左”思潮的危害，划清一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是非界限。翦伯赞坚持真理的作为引起了某些人的无理的围攻，被扣上种种大帽子。在“文革”期间他遭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12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1978年9月1日，翦伯赞的沉冤得以昭雪，恢复了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声誉。

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杰出的史学家。他的贡献一方面是致力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史学方法论的探讨，另一方面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了中国历史，并进行了史料编纂。翦伯赞一生著作宏富，重要论文集有《中国史论集》第一、二辑，《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后改题《翦伯赞史学论文集选集》一、二、三辑）、《史料与史学》。专著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下）、《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后改题《先秦史》、《秦汉史》）。主编有《中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合编有《中国历

①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9年2期。

② 《光明日报》1959年7月17日2版。

③ 《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2版。

④ 《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史概要》等。此外，还主编有资料《戊戌变法》、《义和团》、《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与郑天挺等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一至八册等。

《历史哲学教程》是翦伯赞写作的重要史学理论著作，1938年8月由长沙新知书店出版。全书在《序》之后，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第六部分为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在《序》中，作者提出写作此书的动机有三：其一，为抗日战争提供理论指导。其二，为了澄清当时流传的错误史学理论。其三，为历史科学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在《绪论》部分论述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史的发展以及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提出了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可以将其内容归纳如下：

4 | （一）关于“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关于这一问题，翦伯赞特别强调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所谓历史的一般性或统一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等社会形态的演讲过程。这一“历史的一般法则”是“从几千年来各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抽象出来的”，是“全部分人类具体历史之抽象的说明”，是“一切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共同的现象”。因此，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这个“一般的发展法则为前提”。同时，翦伯赞又提出：“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经过同一相续的诸发展阶段，具有其一般的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环境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探求一般的法则，而且还要“探求特殊形势，即说不仅在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即同时必须辩证地顾及到各个时代的

各个地域之历史的特殊法则。”如果忽视了这种特殊性的探求，其结果一定会被观念论者牵引到抽象结论上去。翦伯赞在分别论述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各自的重要性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正确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全法则性，只是孤立地考察一般法则与特殊法则个别的作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统一。”他说：“在历史发展中，特殊性与一般性不能游离；同时，也不能以一般性去掩盖特殊，前者只对后者起主导作用。所以只有从把握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统一这个观点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本身之具体内容。”如果以一般性去掩盖特殊性则必然不能把握诸历史阶段的特征之具体内容。反之，如果只去夸大个别民族史的特殊性，而忘记其一般性，或不能把这些特殊性统一于一般性之中，不但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无法得到正确的说明，而且必然归结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多元史观。

翦伯赞的以上论述，有力地纠正了在此以前的马克思史学家只关注历史发展统一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偏向，为上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转向探求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关于“历史发展的关联性”。所谓历史发展的关联性是指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在历史之纵的发展中同时也就包含着横的发展，历史之纵的发展与横的发展之相互的统一，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相互的作用与统一种种，构成具体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翦伯赞认为：“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灭过程中去理解，即从其无限的关联上去理解，才能理解历史之一贯的发展及其部分与全体之统一性。”翦伯赞又指出中国的历史便是在其境内境外各民族之

相互的浸润中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只有把握历史各个方面的关联性，才能理解各民族的个别历史和世界史，以及各个民族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中之相互的作用与影响。

（三）关于“历史的实践性”。作者认为，“作为历史出发的诸前提，不是抽象的原则，或永恒不变的理性，更不是神圣的预启，而是现实的诸前提。这些前提包括真实的人类存在以及他们的行为，他们生存的物质诸条件”。“所以一切历史的叙述，必须从这些自然的基础及人类的实践行动在历史进行的途程上，变更这些自然基础的这种事实出发。”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中，自然和社会便辩证地统一起来，“所以说物质诸条件，构成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社会之最原始的基础；而阶级斗争，又是历史发展之最基本的推动力。换言之，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实践过程。”所以唯物史观主张，历史研究“不是从理想的或矫造的东西出发”，“而是从真实的活动的存在过程出发”。

（四）关于“历史的适应性”。历史的适应性“即社会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辩证统一问题”。作者在引用马克思有关重要记述之后，认为“马克思很明白的指出历史上各时代的社会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这种生产方法，决定社会政治形态以至意识的一般。同时，他又指明，由于生产力之发展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才引起经济基础的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就变革了各时代的政治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之一般”。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的关系，翦伯赞做了明确的阐释，指出：“意识形态既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反映出来的，所以也必然随着这些基础的发展而发展变革。同时，由于意识对于存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律’，不但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意识的变革；意识的本身，也能给予下层基础以或正或反的作用。”意识形态与经

济基础不是对立的，而是采取一种矛盾之对立与统一的内在关联的形式。

（五）关于“历史的创造性”。在《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翦伯赞在论述历史的关联性中，已经提出要从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统一中把握历史，指出“人类是历史创造者”。1939年本书再版时，作者又写了《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代序”，进一步论述历史创造者问题，指出“历史的不是自动的，而是要依照于活的人类的创造才得以实现”；在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下，我们要进一步理解到“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创造”；同时指出：“史的唯物论者，当认定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的支配律的过程时，并不否认或轻视个人的作用。”尤其是领袖人物，“对于指导一个历史行动，还是有很大作用”，其发挥作用“是看他是否代表着大众的一般要求，是否是为了实现大众的一般要求而领导这一历史行动”。翦伯赞明确论述了人民群众和领导人物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7

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总结。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对胡适、顾颉刚、陶希圣、李季、郭沫若、吕振羽等各家的见解都作了批判，对此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作了总结。

关于前四人，翦伯赞认为成就不大，而对后二人，他在肯定郭、吕研究成绩之后，也指出了他二人的失误，认为郭沫若“在方法论上陷入于全盘错误，陷入公式主义的泥沼”。具体表现是忽视中国奴隶制的特点，认定中国近百年是资本制。关于吕振羽，则认为“他关于封建制内部分期说，也带着一点形式化的危险”。这些评述都表现出翦伯赞要用“活的历史原理”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研究的取向，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起了推进作用。

《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显著的特色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和历史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讨了历史学的科学方法论。《历史哲学教程》除了深入批判唯心史观外，主要的目的是要澄清机械唯物论在解释唯物论上的偏颇，着重强调唯物史观的辩证性^①。

《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它的出版不仅在当时标志着我国史学理论达到新水平，而且在它出版之后整整半个多世纪中，也是国内少见的历史哲学专著。当然，和其他学术著作一样，作为写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尚处在开创时期）的论著，《历史哲学教程》难免带有某些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而且作者本人在以后的著作中也作了修正和发展。

《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8月由长沙新知书店初版后，1939年8月桂林新知书店再版，增加了再版代序。1947年，上海新知书店重印。1949年5月，长春新中国书局再重印。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施德福和张传玺校勘的新版，这次辑入《湖湘文库》即根据这个新版。

翦伯赞著的《史料与史学》一书，是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史料学”与“历史学”的论文集，是一本重要的史学入门之作。在书中谈到的“史料”，不是通常泛称的历史资料，而是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一种专门学问，是研究掌握和运用中国历史资料的具体门径和方法。谈到的“史学”，主要是说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通称“历史学”。

《史料与史学》一书，原本于1946年4月由上海国际文化服

^① 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

务社会出版，共收论文三篇，即《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及《论刘知几的历史学》，后来翦伯赞的学生张传玺在“文革”之后，根据翦伯赞生前的意愿，编辑了增补本，于1985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增补论文亦为三篇，即《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原载《中华论坛》二卷三期，1946年10月1日出版），《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5月20日），《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原为1963年3月29日在广西师范学院所做报告《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后刊于《历史教学》1979年8期）。因考虑《湖湘文库》甲编湖湘文献所选著作撰著时间下限为1949年，故未选辑1949年以后写作的两篇，即《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和《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文本系根据1985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史料与史学》（增订本）。

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作者首先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廿四史具有循环论的观点，正统主义的立场，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在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各种文献的史料价值。强调指出进行中国历史研究时，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搜求。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作者强调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文章又依次论述史料学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辩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这是从史料与相近学科关系中，阐明搜集史料的方法，同时又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高度，建构了

史料学的基本框架，使方法体现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论司马迁与刘知几历史学的两篇文章，翦伯赞对于这两位中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加以高度概括，给以科学的评述。认为司马迁的不朽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他开创了以人为主体的纪传体的方法，从许多个别历史人物的事迹中，显示出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内容；二是他所写的人物传记汇编富有灵魂，《史记》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生动批判的历史，这些成就使司马迁成为了中国历史学的创始人。翦伯赞认为刘知几以怀疑精神、批判的体裁所著的《史通》，其宗旨在于纠正过去中国史学方法上的错误，对以前的中国历史学作了一次总清算。《史通》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之后，论纪传体的各部门，论历史学方法，论历史学文献，使它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方法论的巨著，自司马迁以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所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而已。

翦伯赞在评论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刘知几时提出了批判与继承的重要原则，对于拥有丰富史学遗产的中国史学界，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这无疑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

目 录

历史哲学教程

序	(1)
群众、领袖与历史 (再版代序)	(6)
一、绪论	(31)
(一) 历史科学的任务	(31)
(二) 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	(37)
(三) 历史科学的阶级性	(49)
二、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	(54)
(一) 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	(54)
(二) 关于历史发展诸阶段的几个问题	(58)
1. 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59)
2. 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	(65)
3. 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70)
(三) 历史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发展	(73)
三、历史的关联性	(81)
(一) 怎样理解历史的关联性	(81)

(二) 历史发展中诸阶段的相续性	(86)
(三) 历史发展之外在诸矛盾及其影响作用	(92)
(四) 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	(99)
(五) 从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之全面的发展	(104)
四、历史的实践性	(108)
(一) 从神学、玄学到实验主义的批判	(108)
(二) 史的唯物论者怎样认识这一问题	(114)
(三) 作为历史实践前提的人类与自然	(117)
(四) 是经济决定还是“理性”的体现?	(123)
(五) 历史的动因是人类的“意欲”吗?	(126)
(六) 历史哲学之反动的发展——从“道德论”到“暴力论”	(129)
五、历史的适应性	(136)
(一) 下层基础与上层诸建筑之辩证的统一	(136)
(二) 适应于先阶级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142)
(三) 适应于奴隶所有者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145)
(四) 适应于封建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149)
(五) 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167)
(六) 适应于目前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170)
六、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	(177)
(一) 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之提出及其展开	(177)

(二) 社会形势的发展与历史的飞跃性	(180)	目 录
(三) “历史的怀疑主义者”与中国的古史	(186)	
(四) 对中国历史形势发展之各种不同的见解及其批 判	(195)	
1. 胡适、顾颉刚等的见解及其批判	(196)	
2. 陶希圣的见解及其批判	(196)	
3. 李季的见解及其批判	(202)	
4. 郭沫若的见解及其批判	(205)	
5. 吕振羽的见解及其批判	(207)	
6. 佐野袈裟美的见解及其批判	(209)	
7. 留下来的几个问题与我的见解	(211)	
附录	(218)	3
校勘后记	(218)	
附记	(220)	

史料与史学

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223)
一、导言	(223)
二、正史	(226)
三、正史以外的诸史	(235)
四、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	(245)
五、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	(259)
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	(262)
一、史料与方法	(262)

二、史料探源与目录学	(263)
三、史料择别与辨伪学	(265)
四、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272)
五、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	(276)
论司马迁的历史学	(284)
一、司马迁的传略	(284)
二、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一——纪传体的开创	(292)
三、司马迁的历史方法二——纪传体的活用	(301)
四、司马迁的历史批判——“太史公曰”	(308)
五、余论——史料的搜集编制及其历史观	(317)
论刘知几的历史学	(324)
一、刘知几的传略	(324)
二、刘知几的著作、思想及其历史观	(329)
三、刘知几论中国历史学各流派	(336)
四、刘知几论纪传体的各部门	(340)
五、刘知几论历史学方法	(349)
六、刘知几论历史学文献	(358)
七、余论	(365)